

钱锺书的述学文体

以《管锥编·老子王弼注》为个案的研究



黎兰 /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钱锺书的述学文体

以《管锥编·老子王弼注》为个案的研究

黎兰 /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锺书的述学文体:以《管锥编·老子王弼注》为个案的研究 / 黎兰著. — 太原:三晋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457-1119-6

I. ①钱… II. ①黎… III. ①道家②《道德经》—研究 IV. ①B22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5973 号

钱锺书的述学文体

著 者: 黎 兰

责任编辑: 薛勇强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www.sjcbns.cn>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太原市隆盛达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1119-6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 例

1.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以《管锥编·老子王弼注》为个案的细读,第二部分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管锥编》文体特征的研究。

2. 为了显示出《管锥编·老子王弼注》的结构特色,本书只是择取19节文字中的五篇文字进行细读。细读分两部分,正文是紧贴原文的研究,附录是所分析章节的原文,并对原文从文脉上进行梳理。这种梳理是一种尝试,类似于篇章段落的分析,权且以“章句”名之。

3. 正文分析的文本,以中华书局1986年版《管锥编》为标准;附录采用的原文,以三联书店2002年版的《钱锺书集·管锥编》为标准。正文中凡涉及原文,只标明页码,不再另行注明版本。

4. 正文中引用的《谈艺录》,以中华书局1984年版本为标准,凡引用原文,只标页码,不再另行注明版本。

5. 引文中涉及的注释、外文,如非必要,一律省略。引文中涉及的人名,保留原版中外文。

6. 《管锥编·老子王弼注》共19节文字,针对《老子》81章展开。为了称呼方便,在本书中统一如下:《老子》原文称章,钱锺书的十九节文字称篇,《管锥编·老子王弼注》称编。

7. 正文和附录的题目,依照《管锥编·老子王弼注》原来的标目。如:“二一章‘道’与‘名’”,“二”指此文在《管锥编·老子王弼注》十九篇中位列第二篇,“一章”指本篇论述的是《道德经》第一章,“‘道’与‘名’”指《管锥编》原来的标目中这篇文章的标题。

目 录

凡 例	1
一 老子王弼本 龙兴观碑本	1
附： 一 老子王弼本 龙兴观碑本(章句)	23
二 一章 “道”与“名”	27
附： 二 一章 “道”与“名”(章句)	44
附： 不说、不可说、不必说、不应说、不想说、不用说、说不出 ——钱锺书对“无言”诸象的分析	54
三 二章 神秘宗之见与蔽——正反依待	72
附： 三 二章 神秘宗之见与蔽——正反依待(章句)	90
附： 钱锺书说“六门”	100
一六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上)	118
一六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下)	134
附： 一六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章句)	153
附： 九 一七章 “法自然”(章句)	162
附： 修辞机趣,是处皆有 ——论老子的为文意愿	169
一九 七八章 正言若反	189
附： 一九 七八章 “正言若反”(章句)	201

钱锺书的述学文体

——从《管锥编·老子王弼注》说起	205
一、《管锥编·老子王弼注》:作为结构完整的专著	206
二、“结构完整”与“圆活”之辩	208
三、“具体的鉴赏与评判”的辩证	218
四、解读“自发的见解是自觉理论的根苗”	226
五、以“具体的鉴赏”与“周密的理论”反观《管锥编·老子王弼注》	237
参考文献	245
后 记	250

一 老子王弼本 龙兴观碑本

这是《管锥编·老子王弼注》第一篇，应与第二篇论“‘道’与‘名’”合观，共同作为《管锥编·老子王弼注》的序言。

序言之所以分为两篇，因为各有侧重，一篇偏重于“中”，一篇偏重于“西”；一节偏重于破，一节偏重于立。所谓“破”，即破除以训诂为义理的乾嘉学风。

因此，虽然第一篇的文字是版本选定的说明，但唱主角的不是王弼或王弼本，而是围绕龙兴观碑本展开的事实与评判。

一、龙兴观碑本在《老子》版本史上的地位

先从版本史中来确定龙兴观碑本的位置。钱锺书说：

王弼注本《老子》词气鬯舒，文理最胜，行世亦最广。晋、唐注家于马迁所谓“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者，各逞私意，阴为笔削。欲洗铅华而对真质，浣脂粉以出素面，吾病未能。原本本相，其失也均，宁取王本而已矣。清中叶钱大昕、严可均辈始盛推唐中宗景龙二年易州龙兴观碑本。

文字很是简练，读懂却不易，必须对相关知识有足够了解。以治学严谨著称的朱谦之在其《老子史料学》中，对老子版本的演变史曾作过详细的介绍，可以看成是钱锺书这段概述的知识背景：

老子《道德经》旧本，流传最广的是河上公和王弼二种。河上本属民间系统，文句简古，其流派为景龙碑本、遂州碑本与敦煌写本，多古字

亦杂俚俗。王本属文人系统，文笔流畅，其流派为苏辙、陆希声、吴澄诸本，多善做文章，而参错自己见解，和古《老子》不同。到了开元御注本出，因时世俗尚，依违于河上、王二本之间。今所见正统《道藏》中的，不是开元御注如强思齐、杜光庭、李约、刘惟永辈，即是从政和（宋徽宗）御注，如李霖、邵若愚、江澈、彭耜诸本。由此可见，今所传《老子》版本，都非汉代旧本。所可称为古本的如严遵与傅奕。严遵本与河上本相接近，傅奕本则为王弼本的发展，这是《老子》旧本的两大系统。就严本论，近怡兰堂校刊据明姚舜咨手抄蓝格本，较《道藏》本及《秘册汇函》本为胜。惟此书即残阙将半，所传经文除可与河上公本相参证外，缺乏成为独立定本的条件。傅奕校定《老子》古本，字句独较他本繁了一些，毕沅据之作《道德经考异》，劳健则参之以范应元本作《老子古本考》，实则傅本文辞繁多，比较王弼本更进一步。刘师培《老子斟补》，疑傅奕本也，曾为后人所改，很正确。范应元本号称古本，而五十五章窜入河上公注文，二十章窜入唐玄宗注文，足证范也不算古。原来《五千言》古本只河上公本差相仿佛，虽现今所传，拿来和《意林》、《群书治要》对校，有很多误谬之处，而分章标题，尤为道流者所妄作。惟在河上、王二注并行之中，河上相传已久，王注则多人所改。孙诒让《礼运》（卷四）已疑今本王注不分道德二经和《释文》本不同，为唐时王注有别本之证。洪颐煊《读书丛录》（卷十三）则竟称“王注出于明代，或后人掇拾为之”。拿河上和王注本相较……河上本已较王本为优。但同在河上本之中，又有北方传本和南方传本的不同，宋刊本介在南北二本之间，因在王本盛行之后，曾据王本妄改过经文。北方本以敦煌发现的六朝唐写本为代表，即敦煌本。南方本则以日本奈良圣语藏镰仓旧钞卷子残本以及东北大学教授武内义雄所藏室町时代抄本为代表。就中北方本又胜过南方本，以字数来作证，北方本据法京图书馆所藏敦煌本残卷末尾题“道经三十七章二千一百八十四字，德经四十四章二千八百一十五字，五千文上下二卷合八十一章四千九百九十九字”。南方本依室町期的古写本，有五千三百二字。详细二本的不同，据武内氏说，乃由于南北朝以

来,河上本的传播,河北和河南各地风俗言语的影响不同,南本详而北本略,略的字数与《五千言》古本相同,详的则以意改字,以求合于文人系统。由此可见,敦煌本是很有价值的了。敦煌本有六朝及唐写残卷,罗振玉《道德经考异》所据诸本,合以武内义雄所见法京图书馆所藏残卷,再加上北京图书馆旧藏唐写本《道经》残卷,凡得其全,惟仍美中不足,其中缺的地方,尚须以《道藏》罔字号所收《道德真经次解》与景龙碑本来补足。那么,即取景龙与《次解》做《老子》定本,应该说是更有理由的了。但《次解》本即遂州碑本,因为原碑不存,赖《次解》而成,这是一个缺点,故不如唐景龙二年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之更为可靠甚明。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认景龙碑本为初唐所刻,字句与它本不同,皆从古字,以为胜过他本。严可均也说世间真旧本,必以景龙碑为最,共异同数百字,文谊简古,胜今本很多^①。

我们对朱谦之这段文字略加梳理:

1. 《老子》版本,分为两个体系。一是以河上公本为代表的民间系统,文字简古,多古字亦杂俚俗;一是以王弼为代表的文人系统,善做文章,多参错自己见解。景龙碑本属于第一个系统。

2. 所传《老子》版本,都非汉代旧本,而是唐以后整理修改而成。

3. 唐以后的版本,多在字句上进行修改增删。此即钱锺书所说:“晋、唐注家……各逞私意,阴为笔削。”

4. 《老子》版本考订的另外一个标准,“马迁所谓‘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以5000字数为标准,古本中河上公本最接近,王弼本被人改动最多。

5. 现存版本中龙兴观碑本时代最早(初唐),字数最简,钱大昕、严可均认为这是最好的版本。

也许需要强调一下:朱谦之写作此文的时代是1954年,钱锺书写作《管

^① 朱谦之:《老子史料学》,《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收入《朱谦之文集》第4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6-227页。

锥编》的年代是1972年^①，此时帛书本与楚简本尚未出土。因此，辨析哪个版本最能体现古本原貌，他们都没有我们这个时代幸运和便利。

但对古本原貌本身，朱谦之与钱锺书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朱谦之认为版本学的目的就是考究哪个版本最为接近原貌。虽然我们无法回到《老子》最早的版本，但离创作的年代越近则价值越高，版本学的科学性就建立在此基础上。故而在上述论述后加以总结：

从版本学以至校勘学，其目的务在使《道德经》的文字能够接近原本的本来面目。因此，第一，读本务要全面。《实践论》告诉我们，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与合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观念与理论来。所以搜集《老子》版本，务要应有尽有，务要根据《老子》文传于今之最古的。^②

钱锺书认为，“欲洗铅华而对真质，浣脂粉以出素面，吾病未能”。对于古本原貌的恢复，钱锺书认为，这是无法达到的理想，也是我们应该接受的现实、放弃的追求。“原本本相，其失也均”，既然无法恢复古本的原貌，那么，唐代与明代的区别，不应该成为版本优劣的标准。

版本考证是实证主义的方法，科学性为其追求的目标。朱与钱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中，哪一种更具有科学性？

二、如何看待钱大昕的研究

更大的不同，在于对钱大昕的态度上：

^① 朱谦之注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写作年代为“1954年6月初稿，1957年3月增补”。同上，第381页。据《管锥编·序》，杨绛、周振甫等回忆，《管锥编》写作时间为1972—1975年。周振甫：《周振甫讲〈管锥编〉谈艺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3—34页。

^② 朱谦之：《老子史科学》，《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收入《朱谦之文集》第4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8页。

朱谦之说：“我对《老子》版本的意见是，也认为以景龙碑为最美。”^①这可不是一句虚文，而是有一部呕心沥血的大作《老子校释》为证。朱谦之在《老子校释·序文》中说：

钱、严二氏之说，余意皆然之，故作《老子校释》，即取景龙碑本为底本，以与敦煌本、遂州碑本、旧钞《卷子》本、《御注》本、严遵本、河上本、王弼本、傅奕本、范应元本互相参校，并加考订。浅学如余，非敢有越前修诸子，盖惟衷取群解，略发指趣，亦欲以此去伪存真，竭其绵薄，以复《五千言》古本与乎声韵文句之真，并藉以窥见古代哲学诗之真面目焉。此则余之新本《校释》之所为作也。^②

从内心的服膺到行动的遵循，钱大昕可谓朱谦之心目中的学界楷模，“非敢有越前修诸子，盖惟衷取群解，略发指趣，亦欲以此去伪存真，竭其绵薄”，意味着自己的整部《老子校释》是在钱大昕的引发下，对其理念的实现。而这种以去伪存真、窥见古书真面目为祈向的探寻，已然得到了后人在学术史上的赞许。我们不妨略窥一二：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

本书可谓集古今中外《老子》校释之大成，其所据版本达六类（石本，写本，佚本，道藏本，刻本等）105种，而所用考订书目达146种，广泛地吸收和综合了古今中外学者在版本、校勘、训诂、音韵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书前序文将《老子》版本分为两大系统，即以河上公、严遵本为代表的民间系统和以王弼、傅奕本为代表的文人系统，介绍和分析了它们的特点、优劣和流行情况；书后附录有《老子韵例》，总结出24种韵例。正文81章先校勘后训诂，广引各家之说，断以己见，每章之后附有“音韵”，考定该章的韵和韵脚，研究语言结构及其演变，这是该书的一个突出特点。

本书是“以复《五千言》古本与乎声韵文句之真，并藉以窥见古代哲学诗

① 朱谦之：《老子史料学》，《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收入《朱谦之文集》第4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7-228页。

② 朱谦之：《老子校释·序文》，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页。

之真面目”为追求目标的,因此作者经反复地比较鉴别而选取景龙碑本为底本,而与敦煌写本、遂州碑本、严遵本、河上公本、王弼本、傅奕本等互相参校,并运用历史的观点,从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版本的流传演变等方面详加考定,力求去伪存真,恢复其本来面目。……本书史料非常丰富,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价值。^①

《二十世纪中国老学》

朱谦之在旧作的基础上增改成一部《老子校释》,以景龙碑本为底本,与敦煌本、遂州碑本、旧抄《卷子》本、《御注》本、严遵本、河上本、王弼本、傅奕本、范应元本等互相参校,详细考订,既有申讲,又有音韵,确属经典性的《老子》校释著作。^②

这部《老子校释》是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中所收三部《老子》注释之一,另两部为《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王弼撰,楼宇烈校释)、《帛书老子校注》(高明撰)。有意思的是,另两部都注明了版本,只有朱谦之的为:《老子校释》,朱谦之撰。

钱锺书眼中的钱大昕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清中叶钱大昕、严可均辈始盛推唐中宗景龙二年易州龙兴观碑本。倡新特而矜创获,厌刍豢而思螺蛤,情侈意奢,奖誉溢量,无足怪而亦不必非者。逮今时移事往,言迹俱陈,善善从长,当戒偏颇。柳宗元《陆文通墓表》尝讥专己訾异者曰:“党枯竹,护朽骨。”龙兴顽石之不必党护,犹枯竹与朽骨耳。

“无足怪而亦不必非”,钱锺书似乎轻描淡写,但对钱大昕则是致命的。钱大昕为乾嘉学派杰出代表之一,“实事求是”是人们对钱大昕最常用的标签,客观的态度、真相的求索,是其安身立命之本。可钱锺书说:“倡新特而

^① 方鸣、金辉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26页。

^② 熊铁基等著:《二十世纪中国老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8-229页。

矜创获，厌乌豢而思螺蛤，情侈意奢，奖誉溢量。”翻译成咱们的大白话，则是钱大昕提倡“碑本”，仅出于搏取眼球的需要，故有意地迎合了受众换新口味的要求。堂而皇之的“去伪存真”，私底下却是一种“以意为之”，不过体现了他的一种主观偏向罢了。

如果对钱锺书的整个思想体系有更深刻的了解，我们将会明白，钱锺书对钱大昕的判断，并没有看起来的这么刻薄严苛，不过是对整个乾嘉学派强调的客观性、公正性持彻底的怀疑，这其中的根由，可以归之于对“实证主义的造反”：

所谓“实证主义”就是烦琐无谓的考据、盲目的材料崇拜。在解放前的中国，清代“朴学”的尚未消减的权威，配合了新从欧美进口的这种实证主义的声势，本地传统和外来风气一见如故，相得益彰，使文学研究和考据几乎成为同义名词，使考据和“科学方法”几乎成为同义名词。那时候，只有对作者事迹、作品版本的考订，以及通过考订对作品本事的索隐，才算是严肃的“科学的”文学研究。一切文学批评只是“词章之学”，说不上“研究”的。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大辩论的一个作用，就是对过去古典文学研究里的实证主义的宣战。反对实证主义并非否定事实和证据，反对“考据癖”并非否定考据，正如你们的成语所说，歪用不能消除正用。文学研究是一门严密的学问，在掌握资料时需要精细的考据，但是这种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能让它喧宾夺主，代替对作家和作品的阐明、分析和评价。^①

钱锺书的知音好友郑朝宗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钱锺书早在青年时期就已立下志愿，要把文学批评上升到科学的地位。”^②钱锺书说：“我一贯

^① 钱锺书：《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79页。这是钱锺书1978年参加意大利欧洲汉学家第26次会议时所提交的论文。

^② 郑朝宗：《但开风气不为师》，李明生编：《文化昆仑——钱锺书其人其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8页。

的兴趣是所谓的现象学。”^①我们知道,胡塞尔创建现象学的初衷是建立一门关于纯粹现象的严格科学,在他看来,实证主义并非严格的科学,具有不可避免的主观性。不妨引用具有现代人文修养的刘笑敢对古代学者追求恢复老子“古本原貌”的评价,权当代钱锺书立言:

古人或今人在加工底本或古本时,其最高的或形式上的理由往往是古本“应该”如何,但是这种对古本应该如何的思考实际上是受编校者自己的思考逻辑的引导,受自己的时代的理解标准的局限。因此,通顺合理的标准与古本旧貌的标准的一致性,实际上仍然是取决于编校者个人的判断。这种判断的标准简单说来往往是“应该”如何,或如何“更好”。这种“更好”的标准当然有因人而异的成分,不同时代、不同编校者的标准还是有明显的共性的,比如文句通顺、思想清晰、句式整齐、各章之间用语一致、尽可能押韵等等,这些标准加在一起,就构成了编校者心目中的校改标准。这些标准无论称之为“古本原貌”还是“通顺合理”都不重要,尽管形式上编校者往往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标准归之于古本旧貌,并以此作为理想标准的“合法”依据。^②

三、对钱大昕的驳难? 与朱谦之的交战?

钱大昕《唐景龙二年老子道德经跋》原文不长,不妨摘录如下:

案河上公注本“道可道”以下为道经卷上,“上德不德”以下为德经卷下。晁说之跋王弼注本,谓其不析道德而上下之,犹近于古。不知陆德明所撰释文,正用辅嗣本,题云“道经卷上”,“德经卷下”,与河上本不异。晁氏所见者,特宋时转写之本,而翻以为近古,亦未之考矣。予家

^① 钱锺书:1983年7月23日给朱晓龙的复信,未刊。转引自胡范铸:《钱锺书学术思想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页。

^② 刘笑敢:《导论——版本歧变与文本趋同》,《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9-40页。

藏石刻《道德经》凡五本，惟明皇御注本及此本，皆分道经、德经为二，盖汉、魏以来篇目如此。而此本为初唐所刻，字句与他本多异。如“無”作“无”，“愈”作“俞”，“芸”作“云”，“誉”作“豫”，“荒”作“忙”，“佐”作“作”，“噲”作“翕”之类，皆从古字。又如“故能蔽不新成”，石本作“能蔽复成”。“师之所在，荆棘生”下，石本无“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二句。“上将军居右”下，石本无“言以丧礼处之”句。“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石本但云：“是以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此类皆远胜他本，聊举一二，以见古石刻之可贵也。武亿曰：分老子道经卷上，德经卷下，亦与古本相仿。后陆放翁题跋云：“晁以道谓王辅嗣《老子》曰：‘《道德经》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犹近于古。’今此本已久离析。”然则宋已失辅嗣定本。今邢氏《论语》疏引《老子·德经》云：“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此其可征之一也。然又考《汉书》注，如颜氏于《魏豹传》，引《老子·道经》曰：“国家昏乱有忠臣。”《田横传》引《老子·德经》曰：“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楚元王传》引《老子·德经》云：“知足不辱。”《严助传》：老子所谓“师之所在，荆棘生之”者也。师古曰：“《老子·道经》之言也。”《扬雄传》“贵知我者希”，师古曰：“《老子·德经》云‘知我者希，则我贵矣’。”《酷吏传》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师古曰：“《老子·德经》之言也。”“下士闻道，大笑之”，师古曰：“《老子·道经》之言也。”《西域传注》：《老子·德经》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为粪”。盖其所引以道、德分篇者若此，而与《释文》题“《道经音义》”、“《德经音义》”者并合。又贾公彦《周礼·师氏疏》，亦以为《老子·道经》云：“道可道，非常道。”其下案《德经》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章怀太子注《后汉书》，其于《翟酺传》也，则又谓《老子·道经》曰：“鱼不可以脱于泉。”是数子于初唐时，并同所证。（梦真客碑：“稽之道经，以慈为宝。”）其必袭自晋、宋旧本，如此碑所分

题，固有据也。^①

钱大昕考证龙兴观碑本为古本，从三方面进行：1. 龙兴观碑本分为《道经》、《德经》两部分，是依循汉魏旧习。这是其文中费力最多的部分。2. 多从古字：如“無”作“无”，“愈”作“俞”，“芸”作“云”，“誉”作“豫”，“荒”作“忙”，“佐”作“作”，“喻”作“翕”之类，皆从古字。3. 文义远胜他本。钱大昕引用来给石本作参照的“他本”，如“故能蔽不新成”、“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等都是通行王弼本的文字。因此，“远胜他本”，意味景龙本完胜王弼本。

针对钱大昕的考证，除了以《道经》、《德经》来定古今以外，钱锺书一一进行了批驳：

1. 钱大昕所谓的“字之从古”，并不能保证文本为古。

这从两方面来加以论证，一是钱大昕所引用者，有些并非古字，而是道士自创的文字，道俗之别，非古今之分：

夫“無”作“无”，正如“气”作“炁”、“梦”作“棼”，自是《参同契》、《真诰》以还，道流相沿结体，亦犹僧侣书“归”作“皈”、“静虑”作“青心”，皆所以立异示别于俗人书字者。余少时见斋醮青词黄榜犹然，不得概目为“古字”。道俗之别，非古今之分也。

一是后人在书写时有意地运用古体字来创作书法作品，“字太古适征其本之非真古”：

以字之“从古”定本之近古，亦不尽愜。匹似有清乾嘉以还，学人作字，好准《说文》，犹徐铉之以小篆体为楷书、魏了翁之以小篆体为行书（《徐公文集》附李昉《徐公墓志铭》、刘辰翁《须溪集》卷七《答刘英伯书》），施之于录写四六文、五七言律绝诗、长短句，聊示抗志希古。

从而得出他的结论：“盖从古有二，勿容淆而一之。不自知之因袭，此可以沿流溯源者也；有所为之矫揉，此则刻意‘复古’。”即从起因上来说，古字

^① 钱大昕：《唐景龙二年老子道德经跋》，《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续》卷2，《续修四库全书》（史部·金石类），第89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69页。

的出现可以有不同的原因,既可能是真的来自于古人,也可能是不自觉地因袭,还可能是有意识地希古或造假。“事已断弦,心图续尾,未渠可从而推见其所径接亲承者也”,面对古本原貌无法考订的现实,不可单单一句“字之从古”一条即判断版本真伪。钱锺书曾说:“故不欲言因果则已,若欲言之,则必详搜博讨,而岂可以时地二字草草了之哉!由前之说,则妄谈因果,乖存疑之诫,是为多事;由后之说,则既言因果,而不求详密完备,又为省事矣。”^①钱大昕大约是难逃“乖存疑之诫”“非详密完备”的指责了。

2. 从文义来看,两本各有胜处。但总体来说,王本胜于碑本。

“本之‘胜’否,依文义而不依字体”,在文义这一点上,他与钱大昕达成了共识。但对钱大昕的分析,却认为失之公心。钱锺书认同“能弊复成”这句龙兴观本胜于王弼本,但碑本其他章节,如“二六章之‘轻则失臣’、四三章之‘无有人于无闻’、四五章之‘躁胜塞’、五〇章之‘措其爪’、六一章之‘牡常以静胜牝’、七七章之‘斯不见贤’,诸若此类,或义不可通,或义可通而理大谬,得不谓为远输他本哉?”钱大昕抓住一点以概其余,钱锺书讥为“一禽以概全鼎、得笋而并煮丛竹”,并提出他的原则:“寸长尺短,固宜处以公心。”这是高标准,也是钱锺书的实践论,他在其后的《老子》的分析中,也曾赞赏龙兴观本,如论“其出弥远,其知弥少”,钱锺书说:“景龙本‘少’作‘近’,亦颇达在迩求远、往而复返之旨。”(《管锥编》450)

除了以上两点以外,钱锺书还对碑本的另一个特点加以辩驳:节省助词。

龙兴碑本之尤可笑者,在其节省助词,句法每似无名之指屈而不伸。当缘道士陋妄,书字既“从古”,文词亦以削去虚字为古。谭献《复堂类集·日记》卷五云:“易州石刻语助最少,论者以为近古”;同卷又云:“阅《史记》,知后世之节字省句以为古者,皆可笑也!”后节移并前节,便道出吾意中语。助词虽号“外字”,非同外附。《文心雕龙·章句》

^① 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99页。